

大甸子遗址中猪的饲养与仪式使用

罗运兵

(武汉大学考古系, 武汉, 430072)

摘要: 对居址和墓地出土猪骨遗存的综合研究表明, 该遗址家猪饲养非常发达, 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肉食来源, 而且被广泛运用于丧葬仪式活动中。猪骨材料测量尺寸显示该遗址猪群与同时期的其它遗址猪群相比明显形体偏大, 表明该遗址家猪品种属本土培育的, 而且暗示辽西地区家猪品种存在较明显的连续性。大甸子墓地所用完整猪牲数量之多, 处理方式之独特, 在我国古代独树一帜。大甸子墓地大量的猪牲被完整掩埋, 这可能与当时社会的某种特殊需求有关: 这种需求可能出自政治领域, 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等级礼制; 也有可能出自精神领域, 它反映了一种传统习俗传承;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关键词: 家猪饲养 猪牲

中图分类号: K871 **中图分类号:** A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遗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中心聚落遗址, 它由相邻的居址和墓地两部分组成^[1]。作为 20 世纪 100 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它对重建上古史, 探讨北方和中原地区早期文化关系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几年前, 周本雄先生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移交了一批重要的动物骨骼标本, 其中有一箱出自大甸子遗址中的居址部分^[2]。由于《大甸子》正式报告中对这些动物遗存未作相关报道, 而墓地中出土的大量殉牲遗存又没有收集, 所以这批材料就成了直接研究该遗址先民经济生活、特别是当时家畜饲养以及家畜品种状况的宝贵的实物资料。2007 年, 我们对这批动物骨骼进行了初步整理。这批骨骼数量不大, 共 75 件, 主要是家猪骨骼 (39 件, 至少代表 14 个个体)、家黄牛骨骼 (18 件, 至少代表 2 个个体) 和家狗骨骼 (16 件, 至少代表 2 个个体) 的骨骼, 另有少量的兔子的骨骼。其中的猪骨基本上都是颌骨 (37 件), 而且大多可以测量尺寸或鉴定性别、年龄, 这对探讨遗址的家猪饲养状况很有帮助, 本文将重点就这个方面进行讨论。另外, 大甸子墓地还出有大量的动物牺牲, 其中又以猪牲最为突出, 其用牲数量相当惊人, 其处理方式也非常独特, 这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的关注^[3], 但均只是简单提及, 本文就此也略作进一步分析。

一 居址出土猪骨材料所反映的家猪饲养状况

下面主要从猪的相对比例——包括猪骨在遗址动物群中所占可鉴定标本数 (NISP)、最小个体数 (MNI) 以及它所提供肉量 (MW) 的比例, 年龄结构, 性别比, 测量尺寸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1. 猪的相对比例

表 1 遗址动物群比例构成

	NISP		MNI		MW		附注		
	N	%	N	%	N(kg)	%	个体平均体重	出肉率	个体平均肉量
家猪	39	52%	14	73.68%	700	68.49%	70 kg	70%	约 50 kg
黄牛	18	24%	2	10.53%	300	29.35%	300 kg	50%	150 kg
狗	16	21.33%	2	10.53%	20	1.96%	20 kg	50%	10 kg
兔	2	2.67	1	5.26%	2	0.1	1.5 kg	70%	约 1 kg
合计	75	100%	19	100%	1022	100%			

上表中,各种动物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肉量比例略有差别,但就家猪而言,后者反映的比例已相当一致(70%左右),一般认为肉量比例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对某种(或几种)动物的依赖程度。从这些有限的材料来看,猪肉在当时人们的肉食结构中已占近 70%,这表明人们对猪的倚重已相当突出,也反映出遗址当时家猪的饲养已相当发达。

不过,由于埋藏过程、收集方式、后期保存等原因,现存的这部分动物骨骼可能已远非当时消费动物的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但参考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遗存组成情况(“2145 块可鉴定动物骨骼中,猪、牛、羊、狗占的比例为 48%、24.3%、15.3%、10.9%”^[4]),有关当时人们对猪肉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的认识是应可以肯定的。辽宁建平水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情况也可证明这一点^[5]。

2. 年龄结构

表 2 颌骨统计所反映的遗址猪群的年龄结构

	按右下颌骨统计		按所有下颌骨统计		按所有颌骨统计	
	N	%	N	%	N	%
0.5-1 岁	4	28.57%	4	22.22%	4	14.29%
1-1.5 岁	3	21.43%	5	27.78%	5	17.86%
1.5-2 岁	6	42.86%	8	44.44%	14	50.00%
2-3 岁	1	7.14%	1	5.56%	4	14.29%
3 岁以上	0	0	0	0	1	3.57%

虽然按右下颌骨、按所有下颌骨(包括左右)、按所有颌骨(包括上颌骨和下颌骨)得出的比例略有不同,但 2 岁以下的未成年个体均占了 80%以上。这应是人们有意识控制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1 至 2 岁间的青年个体比例均占 65%左右,其中 1.5-2 岁又均占了 45%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家猪在其肉量峰值期才被屠宰。另外,没有发现半岁以下的个体,可能其幼仔存活率较高。总之,当时的家猪饲养技术已相当成熟。

3. 性别比

按下颌骨犬齿或犬齿孔的形态，可鉴定性别的共 11 件（见附表 2），其中雌性或性别特征不明者有 8 件（犬齿或其齿孔呈椭圆形，不发育）、雄性 3（犬齿或其齿孔呈明显的三角形，较发育），雌性占有明显的优势。雄雌比例失调也可以反映出人为干涉：为提高其肉量的生产效益，一般会将绝大部分公猪在幼年时进行阉割，在阉割技术出现以前则多宰除部分幼年公猪，这样就会加大雌性或性别特征不明个体的比重。有学者指出年代大体相当的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已出现了阉割技术^[6]，我们认为大甸子先民可能也掌握了这种技术。

4.测量尺寸

表 3 大甸子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猪群 M3 长度值的比较

	上颌 M ³ 长				下颌 M ₃ 长			
	标本数	离差区间	平均值	标准差	标本数	离差区间	平均值	标准差
大甸子	6	32-36.42	33.97	1.781	3	36.4-39.87	37.6	1.972
二里头 ^[7]	28	23.93-35.78	29.45	1.695	21	27.3-36.78	33.45	2.637

从 M3 长的测量数据来看，大甸子遗址猪群的形体明显大于二里头遗址同一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猪群。如果说，上表中大甸子遗址下颌 M₃ 数据太少，上述情况还有待验证的话，那么其上颌 M³ 的数据相对较多，但它的长度平均值也明显大于二里头遗址猪群。结合上、下颌 M3 长度值，我们认为这应确实反映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品种差异。M₂ 和 M₁ 长度值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 109 件 M₂ 长的平均值为 20.68 毫米（离差区间为 16.99-25.92 毫米、标准偏差为 1.44），而大甸子已统计的 12 件标本平均值为 22.45 毫米，也明显大于前者；二里头遗址 176 件 M₁ 长的平均值为 16.45 毫米（离差区间为 13.86-19.73 毫米，标准偏差为 1.32），而大甸子平均值为 17.32 毫米（11 件），也大于前者。

有意思的是，夏时期河套地区朱开沟遗址猪群、夏商时期辽东地区的大嘴子遗址猪群、商周时期（商晚至西周）海岱地区前掌大遗址猪群、峡江地区的香炉石遗址猪群、江淮地区何郢遗址猪群的测量尺寸均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遗址猪群已向当接近（见图 1）。这种尺寸趋同现象可能与当时家猪品种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有关^[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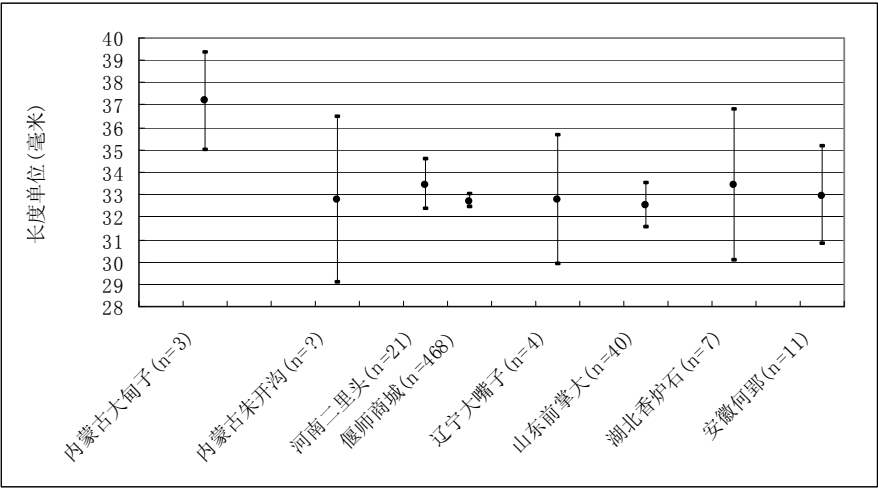


图 1 大甸子遗址猪群与其它先秦时期遗址猪群 M₃ 长度值的比较（均值 95%置信区间）

从上图来看，与其它地区遗址猪群相比，大甸子遗址猪群在形体上明显偏大。根据贝格曼定律，纬度、气候差异也会影响同种动物的形体大小^[9]。由于该遗址位于北纬 42° 以北，而上面提及的其它遗址均位于北纬 40° 以南，所以大甸子遗址猪群测量尺寸明显偏大的现象可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辽西地区遗址猪群形体明显偏大的现象完全可以追溯至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时期。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前仰韶时期和仰韶时期，辽西地区遗址猪群的测量尺寸也明显大于同时期其它地区遗址猪群^[10]。这暗示辽西地区家猪品种是本土培育的，而且过程相当连续。即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家猪形体较大的现象应属本土品种的自然传承，当然，气候与纬度在这一品种的最初形成过程中也起过重要作用。

总之，大甸子遗址当时的家猪饲养已相当发达，主要表现为猪肉在当时人们的肉食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至少在 50% 以上），同时饲养技术已相当成熟，大部分家猪被屠宰于其产肉量的峰值期，并对公猪进行了明显的人为控制（很可能进行了阉割）。后文要谈到的遗址墓葬中大量出现的猪牲，也暗示当时的家猪饲养相当发达，否则难以维系这种惊人耗费。另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该遗址猪群与同时期的其它遗址猪群相比明显形体偏大，表明该遗址家猪品种属本土培育的，而且暗示辽西地区家猪品种存在较明显的连续性。

二 墓地出土猪骨遗存所反映的仪式使用

大甸子墓地墓葬填土和壁龛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们都是丧葬仪式活动中使用牺牲的遗留。据《大甸子》报告附表内容进行的再统计表明^[11]：出有牺牲的墓葬共 232 座，其中填土中出有牺牲的墓葬 153 座，主要是猪牲（128 例 160 头）和狗牲（共 54 例 60 只，其中 29 例与猪牲共出），具体数量组合有 1 猪、2 猪、3 猪、4 猪、1 狗、2 狗、3 狗、1 猪 1 狗、2 猪 2 狗、2 猪 4 狗、3 猪 3 狗、4 猪 3 狗等；壁龛中出有牺牲的墓葬 149 座（其中 70 座在填土中同时出有牺牲），基本上是猪牲（146 例），另有少量的狗牲（3 例）和鸡牲（5 例）。填土与壁龛中所用牺牲的对应情况见下表。

表 4 填土与壁龛中牺牲组合及其墓例数量分布

		壁龛中						
		无牺牲	猪趾	猪趾+鸡骨	猪趾+狗趾+鸡骨	猪头	狗骨	狗头
填 土 中	无牺牲		76	1		1		1
	猪趾						1	
	猪骨架	56	40					1
	猪骨架+猪头			1				
	狗骨架	18	6	1				
	猪骨架+狗骨架	9	17	1	1			
	猪骨架+猪头+狗骨架		1					

就猪牲而言，最常见的摆放方式有三种：在壁龛中放置猪趾骨（实为猪蹄，下同；77 例）、在填土中摆放较完整的猪（65 例）、在填土中摆放较完整的猪的同时在壁龛中放猪趾

骨（62 例）。三者共计 204 例，占墓地出有牺牲墓葬总数的 88%左右。很明显，猪牲在该墓地用牲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对完整猪牲的使用非常突出，下面重点对此讨论。

首先，其处理方式非常独特：一般是除去猪的四蹄，头尾具全，猪头向北（头向均与墓主的头向一致），平放于在填土中，而猪趾骨（猪蹄）则集中堆放于墓葬的壁龛内；有的肋骨末梢也偶见切割痕，可能当时已对猪牲进行腹部开剖处理（去其内脏）。与之相应的是，填土中的狗牲却极少用全牲，一般只有头和四足，而不见躯干。这种对猪牲、狗牲的处理方式与我国广大地区史前墓葬中用牲习俗明显不同——史前时期主要流行的是用猪颌骨（或头骨）随葬，狗牲则是用全牲；也迥然有别于商周时期墓葬中的用牲习俗——这一时期猪牲多用腿牲、狗牲则多用全牲^[12]。要提到的是，与大甸子墓地年代大体相当的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第三、四段遗存的墓葬中也出有大量的猪牲（还有羊牲和牛牲），但都只用下颌骨^[13]，与史前时期流行的习俗一致，而与大甸子墓地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其数量相当惊人。不计猪趾骨 1 例和伴出猪头 2 例（共 3 个个体），填土中出土较完整猪牲共有 127 例，个体数量达 157 头，其中用 1 猪的 108 例、用 2 猪的 11 例、用 3 猪的 5 例、用 4 猪的 3 例。据我们的全面统计，整个史前时期现今我国境内墓葬中出土完整和较完整的猪牲仅 16 例 29 头，单个墓地最多不超过 10 头；即便是商周时期也极少见有墓地所用完整猪牲超过 10 头以上者^[14]。在墓葬中如此大量地埋葬整猪，大甸子墓地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也从另一角度暗示遗址当时的家猪饲养已有相当规模，否则难以维系这种耗费。

很明显，使用完整猪牲与仅使用猪头或猪蹄在经济代价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后者而言，献祭的仅是猪的一小部分，而其它部分则被生者所消费，但献祭完整猪牲则完全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讲，大甸子墓地对猪如此的“浪费”，表明这种用牲活动应与某种特殊的需求有关。

我们认为，这种需求可能来自政治领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作为一个成熟的方国文明，已有明显的等级礼制存在^[15]。丧葬活动中完整猪牲的使用可能就与这种等级礼制有关。已有学者指出，商王室在祭祀活动中对牺牲的大量耗费，主要是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16]。不排除大甸子墓地的情况与之类似。实际上，这方面已有一些线索：首先，目前其它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中还缺乏类似的考古记录，很可能这种特殊的用牲仪式正好与大甸子遗址作为中心聚落的特殊性质有关。其次，对这些出土完整猪牲墓葬的统计表明，它们基本上出自于各墓区的大中型墓葬中（其中大型墓葬中的比例更高），小型墓葬中极为少见（见表 5），而且男性占有的优势非常明显^[17]。很明显，这种“礼遇”并不是一般聚落和普通阶层能享受。

表 5 填土中出土完整猪牲墓葬的空间分布

墓区 亚区 殉牲墓数 等级	南区(116)						中区(143)		北区(545)						小计	
	a	b	C	d	e	f	a	b	I	II	III	IV	V	VI	N	%
	42	12	17	8	18	19	98	45	113	65	73	153	94	47		
大型(143)	4		2		1	2	8	3	12	5	6	12	5	4	64	44.76
中型(434)	4	1	3	1	3	3	8	5	2	4	6	6	10	5	61	14.06
小型(175)												1		1	2	1.14

注：另有 52 座残墓未包括在上表大型、中型和小型墓中。

“射豕”仪式的存在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该墓地部分完整猪牲的颈椎或脊椎骨缝隙中尚存有刺入的骨镞（见表 6）。《大甸子》报告指出：“因为刺入这些部位并不能致死，若是屠杀家畜又何必射而后杀，这或系经过某种仪式留下的痕迹”。《周礼·射人》：“祭祀必射其牲”，郑玄注曰“丞尝之祀，有射豕者”，《周礼·司弓矢》：“凡祭祀，共（供）射牲之弓矢”，郑玄注曰：“射牲示亲杀也，杀牲非尊者所亲，惟射为可”。王仁湘先生据此认为这些中箭的猪架“有力地证实了射牲的历史事实”^[18]，此说可信。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墓除一座幼儿墓 M482 外均为大型墓，多出有贵重礼器，以男性为主^[19]，墓主可能是比较显赫的贵族，幼儿墓 M482 则可能与其“高贵”的出身有关。

表 6 大甸子墓地“射豕”墓葬登记

墓号	等级	面积 (m ²)	葬具	壁龕	面向	年龄 性别	其它贵重 随葬品
中 a M371	大	3.11	木构	有	西	45±岁 男	铅杖首
北 IV M482	中	0.96	木构	有	东	6±岁 ?	
北 I M483	大	1.61	木构	有	西	25±岁 男	钺
北 I M672	大	3.30	木构	有	西	35±岁 ?	鬲、爵
北 IV M783	大	2.00	木构	有	东	?	
北 I M853	大	2.94	木构	有	西	30±岁 男	钺、爵

注：数据来自《大甸子》第 184 页骨簇统计表和第 362-408 页墓葬登记表。除 M371 出有 2 具猪骨架和 2 个猪头外，其余均只出 1 具猪骨架。

当然，并不是每一座大中型墓葬都殉有完整的猪牲，也就是说，猪牲的使用并不是当时丧葬礼仪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除大甸子墓地这种对猪的特殊处理、完整掩埋可能有着某种原始的宗教意义，即这种仪式活动主要出自精神领域的需求，比如对猪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感情，实际上辽西地区史前时期存在着这种的文化传统。目前辽西地区已出有较多的与猪相关的特殊遗存，而且比较连贯。如兴隆洼文化中经特殊处理的猪头（兴隆沟和兴隆洼遗址的不少房址居住面中上和灰坑中对猪头的集中堆放和部分地在其顶部钻孔^[20]）、“猪首龙”形象（兴隆沟遗址 H35 坑底偏中相对放置 2 个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出躯体的轮廓^[21]）和人猪共葬墓（兴隆洼遗址 M118 墓主右侧埋葬的两头整猪，一雌一雄，占据墓穴底部大半位置^[22]）等；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尊形器上刻划的猪形图案^[23]；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大量出现的猪首形玉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泥塑猪形象^[24]。一般认为这些特殊遗存反映了“猪灵崇拜”或图腾崇拜^[25]，还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中的猪形像暗示了猪崇拜仪式的存在，而且正是这种仪式活动的存在对红山文化中精英阶层的形成不无助益^[26]。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同样存在猪崇拜，但不排除大甸子墓地这种对猪牲的特殊处理可能与该地区史前多见的相关特殊迹象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此，上述“射豕”仪式的存在也完全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原始宗教仪式活动，实际上，民族志材料中存在类似场景，如流行熊崇拜的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就有类似的“杀熊”仪式^[27]（见图 2）。

当然，也不排除二者兼而有之，既是传统习俗的流存，同时也迎合了新时期的政治需要。



图2 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的杀熊仪式（转引自春成秀尔，1995）

三、结语

对居址和墓地出土猪骨遗存的综合研究表明，该遗址家猪饲养非常发达，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肉食来源，而且被广泛运用于丧葬仪式活动中，是墓地用牲中的主要牺牲。总之，家猪在大甸子遗址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甸子居址出土的猪骨材料对探讨辽西地区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该遗址猪群与同时期的其它遗址猪群相比明显形体偏大，表明该遗址家猪品种属本土培育的，而且暗示辽西地区家猪品种存在较明显的连续性。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猪牲遗存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丧葬仪式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大甸子墓地所用完整猪牲数量之多，处理方式之独特，在我国古代独树一帜。大甸子墓地大量的猪牲被完整掩埋，这可能与当时社会的某种特殊需求有关：这种需求可能出自政治领域，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等级礼制；也有可能出自精神领域，它反映了一种传统习俗传承；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致谢：从大甸子遗址当初发掘到现在已足足 30 多年了，大甸子居址出土的这批动物骨骼资料已显得弥足珍贵，在此我们深深地感谢发掘者当年细心的收集，同时也衷心的感谢周本雄先生的妥善保存。本文为国家文物局 2007 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中国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编号 2007027-11/0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二）”中“3500—1500BC 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课题号：2006BAK21B03）资助。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 年。（本文简称之为《大甸子》）。

[2] 这些骨骼表面都标有出土单位，均以 77LOD 开头，具体单位有 H2、H3、H5，T3①、T4A①、T1②、T2②、T3②、T3A②、T4②、T4A②、T6A②、T1③、T3③、T3A③、T10③、T2③B、T1④、T2④等。

这些单位基本上都见于《大甸子》报告中，其中“77”是年份，“LOD”是遗址简称。可知它们出自1977年发掘的居址部分。

[3] 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文物》1981年第2期P79-85。

Flad R. 2001. Ritual or structure? Analysis of burial elaboration at Dadianzi, Inner Mongol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3(3-4):23-52.

吴瑞满：《墓葬习俗中的性别角色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大甸子墓地为例》，见[美]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3-72页。

[4]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燕京学报》第十四期，2003年。

[5] 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其中猪的最小个体数比例约占47%以上。

[6] 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7] 二里头遗址相关数据均见杨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8] 罗运兵：《中国古代家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图1中所列遗址的相关数据均出于此，本文不一一注出。

[9] Davis, S. J. M. 1981.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change and domestication on the size of late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mammals of Israel. *Paleobiology* 7, 101-104.

[10] [12] [14] 同[8]。

[11] 与《大甸子》报告第194页的有些统计数据略有出入，但整体非常接近。《大甸子》报告指出804座墓葬中共有244座殉牲，但附表中缺M2、M54、M55、M669、M767、M768六座墓的详细材料，上述出入可能与此也有一些关联。

[1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1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8-252页。

[16] 冈村秀典：《商代的动物牺牲》，《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5年

[17] 对这些墓葬的墓主性别年龄的统计表明：除13座性别不明外，其中男性75座、共出较完整猪牲104头，女性39座、共有较完整猪牲42头，墓例男女性别比为1.92:1、所用猪牲数量比为2.48:1，男性占有较明显的优势。而且女性墓仅有极少数墓葬（3座）同时埋葬2头猪，不见同时埋2头以上，男性墓有不少同时埋有2头猪，还有少量墓葬埋3头或4头猪。

[18] 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文物》1981年第2期。

[19] 大甸子墓地基本上是男性面向西，而女性面向东。如此则“割猪”墓中可能有2例女性墓，其中的M783还有陶纺轮，纺轮也主要见于女性墓中。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兴隆沟遗址发掘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袁靖、杨梦菲：《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待刊。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 年的发掘》,《考古》2004 年第 7 期。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1 期。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 年第 6 期。
- [2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8 期。
- [25] 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97 年第 1 期。
-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 年第 4 期。
- [26] Nelson, S.M, 1995. Ritualized pigs and the origins of complex society: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Hongshan culture. *Early China* 20: 34-45.
- [27] (日本)春成秀尔:《熊祭祀的起源》,《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第 60 集,1995 年,第 57-101 页。

Pig's raising and using ritually in Dadianzi site

Luo Yunbing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pig bone remains from the Dadianzi site indicated that the activity of raising pig is very outstanding. The domestic pigs were mainly resource of meat to the inhabitant in this site, and the pigs were widely used in buries ceremonies. The data of pig bones in this site provided important clue for discussi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ig-raising in Lao river basin, which made clear that the body size of pig population in Dadianzi site was bigg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 pig population contemporaneous, and suggested that the cultivating of domestic pig breed was successive obviously in this region. In Dadianzi cemetery the number of full pig-sacrifice is very big, and the mode of disposal to pig-sacrifices was extraordinary unusual, which reflected the especial demand. This demand maybe comes from the politics field, which indicated class system; and maybe comes spirit field, which indicated traditional rite; and maybe comes from two sides above at one time.

Key words: pig-raising pig-sacrifice

收稿日期: 2009-03-10

作者简介: 罗运兵, 男, (1975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讲师。